我的老师是男神

杜泽逊正在“校经处”查看书稿。 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找杜老师?去“校经处”蹲点吧

山大教授杜泽逊:治学严谨的“大家长”

他常穿一件白衬衫,外罩黑色风衣,走路挺拔又有精神,在山东大学的校园里,着实吸引了不少同学的目光。很难有人将一位52岁的长者与“男神”的称呼联系在一起,然而他做到了。

他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学教授杜泽逊,曾被学生们评为“山大四大男神”,直到今天,无论学术还是人格,他仍是“男神”一般的人物。

杜老师看上去严肃,教诲严厉不苟,但熟识后,却发现他温和可亲。

本报记者 陈玮

走在校园里,像踩着风火轮

在“校经处”(做项目的办公室)见到杜老师时,他正埋头于一堆书稿中写东西。他很不好意思地让我们先坐下,边说着“马上好马上好”边弄完了手头的书稿,才坐下来与我们聊天。

他的学生说,杜老师做事要按秒计算,从不中断。有一次去台湾访学,他一头扎进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,为了尽可能多看一些古籍书目,一天没吃任何东西,“吃喝需要上厕所,太占用时间。”他说。

这位学生还笑称,如果找不到杜老师,就去“校经处”蹲点,因为他不在“校经处”,就在去“校经处”的路上。

杜老师匆匆喝了一口水说,目前正带着学生做“十三经注疏汇校”项目。“十三经是经学的标志性成果,为什么他们成为后世的经典,理由全都体现在注疏上。”他和学生的工作,就是把十个版本的注疏校勘一遍。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,单是书页就十万余页,这意味着他跟十几个学生一起校勘,要十几年才能完成。

对于以成果论英雄的学术体制来说,做耗时长的项目不是一个好的选择,然而杜老师却做过很多庞大的项目,比如《四库全书存目标注》、《清人著述总目》,历时都在十年以上。只要他觉得有意义,就一定做下去。

尽管项目耗时许久,他仍然坚持反复校勘三次以上,把错误减少到最低,保证书的质量。在做《四库全书存目标注》时,有人曾劝他先出一本,以便于评职称,但在他看来,急功近利粗制滥造,就糟蹋了前人这么好的研究,不如不去做。“好高骛远、好大喜功,只能欲速则不达。”《四库全书存目标注》得到了季羡林的公开赞扬,他也破格评上了教授,一度被学生们称为“学术男神”。

严谨的态度让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事无巨细的“大家长”,每次出差前,他都要给学生群发信息,嘱咐离开“校经处”要关门关电关水关机。

学术上严苛,杜老师只能把时间节省在平时。他的学生说,每次在校园看到他,都是行色匆匆,像是踩着风火轮,聚会能推就推,每天在“校经处”工作到晚上11点,午饭和晚饭大都在食堂解决。

他常对学生说,没有什么比沉下心来做学问更重要。甚至心情不好,就跑到“校经处”,考证出来几个条目,心情就豁然开朗。

讲课的每条例子,都经过深入研究

在文学院的研究生中,流传这样的话,上杜老师的课要早起半小时,否则就没有空座位。

杜老师有一门著名的课程,那就是为文学院和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讲授自己编写的《文献学概要》,在课上,他很少看讲义,经常讲自己的心得体会。

讲到《永乐大典》,他讲过庚子事变时的故事,英国使馆的官兵,把包括《永乐大典》的书籍堆在荷花池中,用垃圾和泥土掩埋,使得数以万计的珍贵典籍化为粪土,令人扼腕叹息。

在杜老师看来,讲出自己的心得,就要求他花大力气备课。“讲课时举出的例子,都是经过筛选留下来的典型例子,首先得保证正确,如果这个不能保证,尽管有趣味性,也不能搬到教材里。”每条例子,杜老师先要深入研究,这样才能让大家收获大,进而兴趣浓,自然而然愿意听课,甚至其他校区的学生也都赶来旁听。

杜老师在考试中,也格外重视学生个人的心得。文献学的期末考试,杜老师允许大家开卷,最后一个大题,每年都要考学生对于文献学这门课程的感受,分值的差距就在这一道题中显现出来。

兴趣,是杜老师看重学生的一个因素,他从来不在课上点名,他觉得,一个课程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喜欢,如果学生不喜欢听,那就不应该强迫他来。“让他有时间去图书馆看看自己喜欢的书,做感兴趣的学问,不也挺好的吗?”

不过,不点名也让他有另一个苦恼,每当学生跟他打招呼,他总乐呵呵地回敬,走远了再打听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,“总是记不住人名。”

在与他亲近的学生看来,杜老师经常“随时开课”,有时候在“校经处”有了心得,就立马跟学生讲述起来,出差时有了对古籍整理新的发现,就群发信息告知学生。引经据典,旁征博引,一旦讲起来,刹都刹不住。

杜泽逊接受采访。
本报记者 张中 摄

给学生发短信,落款是“泽逊上”

“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年都飞来燕子,小燕子孵出来了,老燕子一趟趟出去打食、捉虫子,把它们放出去,教它们飞……小燕子学会了,扑棱飞走了,再也不回头,再也不回来了,老燕子也不埋怨,又开始下一窝……今天大家毕业了,翅膀硬了,就要飞了,希望大家走上新的岗位之后,发个短信给你的老师,因为你们无论飞到哪里,老师都会挂念你们。”

这是杜老师在一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,转发很广,让不少毕业生流下眼泪。“每个学生我都付出了心血,肯定有感情,学生要毕业,就像女儿出嫁了,怎么能舍得。”杜老师说,今年夏天,他的一批学生又毕业了,他特意把学生们毕业的照片冲洗出来,做成了相册,放在“校经处”,没事的时候,就翻翻看看。

在学生眼中,杜老师从没有老师的架子,每当给学生发信息询问,落款总会留“泽逊上”,让学生大呼“惶恐”。有离校的学生回来看他,杜老师常带他们去学校的自助食堂吃饭,一一聊起学生的近况。有学生工作进展不顺利,就会给杜老师打电话,杜老师就会放下手头的工作,坐下来耐心开导他们。

杜老师平时花钱很节省,背包的拉链坏了很久,也不换新的,时常敞开着。用的手机只有最原始的功能,平时穿的几件衣服,大家都能数出来。但每到节日,他就会把留在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,请客吃饭,甚至还会在家里包饺子给大家吃。“学生是我的财富,他们让我有个念想,这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

从来没有学生看到杜老师发火,他说话一直平缓而温和,大家知道的他仅有的动怒,是为了向山大老晶体材料研究所要一间办公室用作项目研究,那间办公室就是“校经处”。在他的桌上,曾经有一张学生留给他的字条,上面写着: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。

思享

师者说

把做学问当兴趣,才能有大成就

杜老师说,在学习和工作中培养兴趣,才能踏实做事。“如果做学问是业余去做,不投入大量时间,很难达到一定高度。”

如今杜老师已成为国内一流的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专家,但他最初的兴趣却不在此。

“上研究生的时候,我很想学文字音韵学这门学问,于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音韵学、训诂学。”然而,等到毕业分配的时候,杜老师却被分去做古籍目录整理的工作,于是他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兴趣,投入到目录学的工作中。

杜老师很感谢这样的经历,因为经眼的书目多,使他有了深厚的功底,更利于继续钻研下去。“当学习和工作与自己的兴趣不一致时,就培养发掘自己的兴趣,尽量让它们融合,否则,无法深入任何一方,也难以取得好的成就。”

在培养兴趣的过程中,杜老师明白了“老师”的重要性。“当时我的老师王绍曾先生给我开了很多书目,让我写提要,我就不得不去翻,得有100多篇。王先生总是给我亲笔修改,无论是内容还是措辞,都是非常仔细的。”与此同时,王先生待人接物的礼貌,也让杜老师耳濡目染,影响了他的行事。

他说,教书与育人是分不开的。育人不是我们常说的思想道德课,而是在教书过程中潜移默化影响学生。“老师是十分重要的。正是由于老师的鼓励,培养了自己对于目录学、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兴趣,也影响了自己的行为。”